

三星在天:夏墟地理与传说考辨

刘宗迪

摘要: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将上古华夏世界分为东、西两个集团,以夏为西方集团,主要活动于河南、山西、陕西地区,这一学说对古史重建和夏商考古的影响有目共睹,由于豫西、晋南、陕北等地多处大型龙山文化聚落遗址的发现,夏居西方几成学界共识。夏居西方说的一个重要根据,是《左传》叔虞封于夏墟的记载,周成王灭唐,封晋祖叔虞于夏墟,因晋居河东,故可推定叔虞所封的夏墟必在河东,汉魏以来,学者皆承此说。实际上,这一推定并不成立。详考古书所载周成王时期封国格局、唐杜氏及其后裔晋国范氏的世系、迁徙和祭祀传统,可知周成王灭以封叔虞的唐国,不在河东,而在鲁西。叔虞始封的夏墟,实在鲁西河、济之间,其子燹始迁于河东。既然夏墟在鲁西而不在河东,则“夷夏东西说”以及基于这一学说的夏墟考古和古史重建,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关键词:夏墟;夏墟考古;夷夏东西说;大禹治水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0.06.05

夏为古史传说中开启华夏世袭王朝历史的第一个朝代,古人论华夏道统,往往“三代”并称,而夏居其首。夏的历史,关乎华夏历史的起点,因此,夏墟所在,一直是现代古史学、考古学挥之不去的热点话题。

据古书记载,山西河、汾之间为“夏墟”,而豫西伊、洛之间则为“有夏之居”,故自来考夏地者,最关切两处地方,一为晋南,一为豫西。豫西“有夏之居”一说,出自《逸周书·度邑解》,牵扯伊、洛地名的变迁和牧野之战的地理,头绪纷繁,请俟另文详论。河东“夏墟”之说,本自《左传》晋祖叔虞封于夏墟的记载,而为汉晋间学者所祖述,至今犹为考古史者引为典据,深信不疑。然而,详考此说源流,其中实隐藏一巨大的误解,而前人俱未留意。

夏墟所在,关乎古史重建的地理基础和华夏历史的空间起点,不得不为之详辨,故笔者不揣浅陋,略布管见,以就正于学界同道。

一、河东夏墟

河东夏墟,其说本自《左传》的三处记载。其一,《左传》昭公元年载晋平公有疾,郑国子产赴晋聘问,为晋侯说晋祖叔虞所封唐地的掌故云: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阍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阍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

其意谓高辛氏有两个儿子,老大叫阍伯,老二叫实沈,两兄弟天天打架,高辛氏不得不将兄弟俩分家,让阍伯住在商丘,让实沈住在大夏,分别主祀辰星和参星。辰星即心宿,又称大火星,属东方七宿,相

作者简介:刘宗迪,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 100083)。

当于西方天文学的天蝎座;参星属西方七宿,相当于西方天文学的猎户座。两宿分居东、西,各主春秋,心宿升起时则参宿降落,参宿升起时则心宿降落,两个星宿此起彼伏,永不相见。高辛氏命他的两个儿子分别主祀辰星和参星,意味着这两个冤家对头从此天各一方,不复来往。后来,阍伯所居的商丘被商人继承,实沈所居的大夏则为唐人继承。唐国末世,其君叫唐叔虞,当时,周武王的王后邑姜怀上了孩子,梦到上帝给他腹中胎儿起名曰虞,并许诺将唐国的地盘赐给此子。婴儿降生,果然手心里写着一个“虞”字,因此,到武王之子成王时,灭了唐国,把其地封给兄弟叔虞,叔虞就是后来晋国的祖先。由于商人继承了阍伯的商丘,而阍伯主祀辰星,故商人也主祀辰星,晋人占了唐人的地盘,而唐人主祀参星,故晋人也主祀参星。——由子产所述这段掌故可知,晋国的祖先叔虞初封之地原为唐国的地盘,唐国在大夏,唐为国名,大夏是地名。

其二,《左传》定公四年载卫国大夫祝佗赴召陵之会,因为诸侯排座次发生争执,祝佗为周大夫弘荏追述周成王时周公封建伯禽、康叔、唐叔的掌故,列举晋祖唐叔受封的财产、族姓和土地云:“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祝佗称唐叔受封之地为“夏虚”,并云唐叔所行为“夏政”,这也是“夏虚”一语唯一一次见于先秦古书。《左传》的这两处记载,正相呼应,子产所谓“大夏”,自然就是祝佗所谓夏墟之所在。

其三,《左传》昭公十五年载,晋国荀跖赴周会葬,籍谈为介,周景王求彝器于晋人,籍谈答以晋居深山,戎狄为邻,远于王室,拜戎不暇,无器可献。景王历数王室赐晋之器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罔有戎狄。”所言唐叔所受器物,与《左传·定公四年》合,所言唐叔封地,“以处参虚,罔有戎狄”,则与昭公元年、定公四年呼应,所谓“参虚”,亦即“大夏”或“夏虚”,因唐居大夏而主参,故又称其地为“参虚”,参虚亦即夏墟。

据《左传》所言,叔虞封于唐,其地又称夏墟,叔虞为晋国开基之祖,则晋之所在,亦即唐和夏墟所在。晋在河东,则唐和夏墟必在河东,可谓不言而喻。故自司马迁以降,述史者均以唐人、夏人居于河东。《史记·晋世家》云:“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货殖列传》亦云:“昔唐人都河东。”^①显然就是本自《左传》。

由于古书中称尧为陶唐氏,故汉人又以河东为尧都所在。《汉书·地理志》云:“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又于太原郡晋阳县注云:“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郑玄《诗谱·唐谱》云:“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②至晋人皇甫谧综合古史传记而撰《帝王世纪》,既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又云“(禹)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史记·夏本纪》集解引)^③,可见,以平阳、安邑、晋阳为尧、禹先后所都之地,汉晋时期已成定论。晋阳县见上引《汉书·地理志》太原郡,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平阳县,见《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应劭注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在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安邑县,亦见《汉书·地理志》河东郡,战国时曾为魏国所都,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改称夏县,“因夏禹所都

① 《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集解》引徐广曰:“在河东大阳县。”《索隐》云:“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阳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虚。”(《史记》卷三一,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46—1447页)汉大阳县在今山西平陆县北。此周章弟虞仲所封国即春秋时位于晋南的虞国。《左传》僖公五年,晋侯假道于虞以伐虢,“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即此虞国。据《史记》言,武王封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似表明周武王时晋南即有名为“夏虚”之地。实则,晋人所灭的虞国在洛阳成周北,不在关中宗周北,《史记》云封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其所谓“周”只能指成周,而不可能指宗周。但周武王居于宗周,其时尚未营建成周,是知太史公此文实据后世地名说,则其所谓“夏虚”,亦未必是西周时地名。盖太史公既以叔虞所封唐国在河东,则相信夏墟在晋南,故指认虞国所在为夏墟。

② 郑玄撰,孔祥军点校:《诗谱》,《毛诗传笺》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506页。

③ 《史记》卷一,第15页;卷二,第83页。

为名”^①,今其地犹有夏王城。又因为在传统古史体系中,尧、舜、禹三代禅连相传,尧禅舜,舜禅禹,载于《尚书·尧典》,为古人熟知,尧墟、禹都既然皆在河东,则舜都亦必相去不远,故《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冀州之人也。”《正义》引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皇甫谧《帝王世纪》则径谓:“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阳,或言潘。”(《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②可见,唐尧、虞舜、夏禹三代都于河东之说,实为汉晋之际学者所共述,而求其渊源,无非是从《左传》叔虞封于唐或夏墟的记载孳乳而来。

尧、舜、禹都于河东之说,本自《左传》,且《左传》所载叔虞封于大夏或夏墟的掌故,出自子产、祝佗之口。子产博学多识,晋侯谓之“博物君子”,祝佗则为卫国司祝,《国语·楚语下》云:“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祝官以祝颂祈祷于山川群神和先公先王为职责,故必博闻强记、精通古史。叔虞封于夏墟的掌故既为子产和祝佗所述,必非道听途说的传闻或空穴来风的杜撰。正因此故,自古迄今,言古史者对于尧、舜、禹皆都河东,大都深信不疑。王国维《殷周制度论》(1917年)有见于上古帝王之都多在东方,古书所见夏人都邑和地名亦率在东土,断定“虞、夏、商皆居东土”,以东方为华夏古史的渊薮,因此对尧、舜、禹之都独在河东颇感困惑,但古史相承,无可置疑,为自圆其说,不得不认为河东之都是因洪水之灾而“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③。傅斯年《夷夏东西说》(1933年),分上古华夏世界为东、西两大集团,以夏与周为西方民族,夷与商为东方民族,上古历史即东夷与西夏两大族群交争的历史。傅氏认为“夏之区宇布于今山西、河南省中,兼及陕西,而其本土在河东”,其主要依据即《左传》所载高辛氏二子分居商丘和大夏、晋祖叔虞于夏墟的掌故^④。傅氏此说对现代古史学和考古学的深远影响有目共睹。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1937年)秉承王国维“虞、夏、商皆居东土”说,博引书证,力证夏民族起自东方,驳斥傅氏夏起于西方说,但河东夏墟久为古人称道,明文俱在,终难抹杀,故不得不像王国维一样,作折中之论,认为夏虽起于东方,却因洪水之故或其他原因,而在晚年迁往河洛之西,最终亡于河东,此即《左传》河东夏墟的来历^⑤。实际上,在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宏论发表之前,早在1926年,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李济及其同仁,就已经根据古书中关于河东夏墟的记载,到晋南一带进行“夏墟”调查和考古,1949年后的山西考古也长期以夏墟考古为重要宗旨。著名的山西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正是在寻找夏墟的考古活动中发现的。由于夏墟已经被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占了先机,且在考古年代学上,陶寺遗址早于二里头遗址,既然自古相承有尧都平阳之说,而陶寺遗址正在古平阳附近,因此就被顺理成章地指定为尧都。考古学者甚至将陶寺出土陶器上涂绘的一个朱书符号解读为“尧”字,认为即尧的名号^⑥。

叔虞封于夏墟,夏墟在河东,其说出自《左传》,汉晋学者祖述而不疑,又有考古遗址为之见证,可谓证据确凿如板上钉钉,难道还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余地吗?

然而,正如王国维、杨向奎、沈长云等主张夏为东方民族的学者所指出,不仅古书所言上古帝王之都均在东方河、济之间,而且古书所见夏人的同姓和夏人所交涉诸族,以及有夏一代史迹所涉地理,几乎全在东方,尤其是大禹治水的传说,更只能发生于常遭水患的黄河下游,凡此种种,若以夏为西方民族,则终无法说通^⑦。至于河东地区,则除《左传》定公四年“夏墟”及昭公元年“大夏”两条记载

①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9页。

② 《史记》卷一,第32、44页。

③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452页。

④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01页。

⑤ 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1937年6月1日。

⑥ 何驽:《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解希恭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33—636页。

⑦ 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

外,先秦古书中罕见这一地区有与夏有关的记载,夏墟若果在河东,则古书所见河东的夏代史迹不当如此寥落^①。另一方面,若主张夏在东方,河东夏墟又该如何处置?王国维、杨向奎为自圆其说,以河东夏墟为夏人因遭洪水暂时西迁而留下的遗迹,凭空立论,并无史料支持,终难让人信服^②。

前人相信夏墟在河东,是因为《左传》说唐叔封于夏墟,而唐叔为晋国之祖,既然晋国在河东,故夏墟必在河东,司马迁《晋世家》、班固《地理志》、服虔注《左传》、郑玄笺《唐风》以及后来的地理书如《括地志》《元和郡县志》等言尧都、夏墟所在和唐叔之封,无非是据晋国封域而推求^③。

前人一味在河东晋国封域寻求唐叔所封和夏墟,他们都理所当然地相信叔虞所封的唐国即后来的晋国所在。他们都忽视了一个可能性,即唐叔所封与后来晋国所封,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唐叔封地可能根本就不在河东。

实际上,晋国早期确有迁封之举。《今本竹书纪年》^④载,(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叔虞封唐当即在此时。《今本竹书纪年》又载,康王九年,“唐迁于晋,作宫而美,王使人让之”^⑤,《北堂书钞》卷一八引古本《竹书纪年》云:“晋侯筑宫而美,康王使让之”^⑥,无“唐迁于晋”语,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不言此语的出处,此句当为古本《纪年》所有。据此可知,晋人在叔虞封唐不久即由唐迁于晋。

晋国在早期曾经由唐迁晋,有出土文献为证。香港私人收藏一件青铜簋,簋腹内部有铭文四行22字,朱凤瀚释为:

① 现代史学家中,主张夏起于东方者,王国维、杨向奎而外,还有顾颉刚。顾颉刚在早期亦认为禹出自西羌、夏为西方民族,至其晚年撰著《尚书大诰译证》,则主张夏起于东方,他在此书中除传世文献外,博采金文史料,历考商、周之际东方诸族自东而西的迁徙之迹,指出:“夏代的文物,现在尚未出土,但即从古典文献中搜集资料,也可以看出夏王朝和熊、盈两族关系的深切。祝融族的首一姓是己姓,也即是姒姓,而斟是姒姓明见《世本》(《左传》襄四年疏引),是夏亦祝融族人,一也。《郑语》说‘昆吾为夏伯’,有如齐桓、晋文之于东周,是夏王朝的主要支持者,二也。夏后相失国,依靠斟观、斟寻而生存,三也。汤灭夏时,先伐韦、顾,继伐昆吾,可见韦、顾、昆吾诸己姓国家都是卫护夏政权的主要力量,四也。这四端,都是夏和祝融族的关系。夏后相为寒浞所灭,赖后缙抚育遗孤少康,延夏室一线之传,五也。桀伐有缙,获其二女,遂延亡国之因,六也。这二端,都是夏和鸟夷族的关系。夏代历史,流传下来的本极鲜少,但其荦荦大端者竟无一不与东方这两大族息息相通。……加上《竹书纪年》所记,‘后相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均《御览》八十二引),‘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以上均见《后汉书·东夷传》注引),可见夏王朝和东夷的关系何等密切,往来何等频繁。……近人为了周人自称为‘夏’(例如《书·康诰》的‘肇造我区夏’,《立政》的‘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诗·周颂·时迈》的‘肆于时夏’),《史记·六国表》又说‘禹兴于西羌’,便以为夏族起源西方,夷和夏是对立的两族。不知道周人自称为夏,乃是夏为商灭之后遗族西迁的结果。”(《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29页)顾氏此说,不仅推翻了他自己早期夏出自西方的主张,而且暗批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

② 针对河东夏墟,沈长云先生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他认为,《左传》定公四年称周分唐叔“怀姓九宗”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怀姓”即隗姓,隗为戎狄之姓,唐叔所领“怀姓九宗”实为戎狄,这说明唐叔所封的“夏墟”,实为戎狄所居,而非夏后氏之墟,《逸周书·史记》云:“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西夏”云云,可证其为居于西方的异族,而非三代之一的夏后氏,《逸周书》云唐氏灭西夏,即《左传》唐“困于大夏”之说的来历。叔虞所封夏墟既为异族所居,则所谓夏墟实与三代之夏后氏无关,故不应据叔虞封于夏墟而断定夏朝立国于河东(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按,周人称“夏”,均指华夏、诸夏或夏王朝,或用以自谓,未见有以“夏”指异族者。唐叔统领戎狄“怀姓九宗”,并不足以证明其地即为戎狄的地盘,春秋时,齐、鲁、宋、卫、晋、郑间(今鲁西豫东一带)时有戎狄出没,邢、卫二国至为其所占,但却不能因此认为此地非诸夏之土。周初中国多戎狄,唐叔领怀姓九宗,封于夏墟,意味着当时夏墟附近有戎狄之族居住,唐叔建国于夏墟,必然要将此族纳入其统治,即所谓“疆以戎索”。

③ 关于叔虞初封的唐国所在,陈槃综合前人之说,考证尤详,然大略不脱旧说崖略,参见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三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54页。因先秦两汉地志之书均不载河东有名为唐国之地,故叔虞初封之所在,一直为言晋史者之纠结所在,相关论文有数十篇,诸家虽议论纷歧,要皆不脱河东旧说之轨辙。

④ 自王国维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1917年),以《今本竹书纪年》为伪书,不具史料价值,今人多遵其说。然而,近三十年来,中外学者如倪德卫、夏含夷、班大为、陈力、张富祥、邵东方等学者重新审视《今本竹书纪年》,认为此书虽经后人窜改和增饰,已非汲冢古本原貌,却与汲冢竹书一脉相承,并非全出于后人的伪撰,其史料价值不可一笔抹杀。参见邵东方:《〈竹书纪年〉版本题名之辨析与“今本”真伪之争论(代序)》,邵东方编:《竹书纪年研究(2001—2013)》,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

⑤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下,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2、85页。

⑥ 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八,清光绪十四年万卷堂刻本,第4页a。

覲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①

铭文首字覲,朱凤瀚释为“尧”。“唐”,铭文作“易”,甲骨文商汤皆作“唐”,故“易”即“唐”字。铭文末尾有一族氏符号𠄎,朱凤瀚指出这一符号见于商晚期金文,认为此尧氏有可能为商遗民,但据器型、铭文字体及内容,断定应为西周早期器物。器主尧公,当为封于尧地或以尧为氏的贵族,而“姚”传为尧姓,联系到古书关于尧、舜居河东以及《史记·晋世家》叔虞封唐、叔虞之子燮父始称晋侯的记载,朱凤瀚断定簋铭所称“侯于晋”的唐伯即为叔虞之子燮父,并认为“王命唐伯侯于晋”一语意为周王将唐伯由旧封地改封于晋地:

覲公簋的铭文明言唐伯是受王命而“侯于晋”的,根据其他也言及王命某贵族“侯于”某地的西周金文例证可知,被封者皆是从原驻地迁至此受封之地,所为侯之地是新的封地。……燮父所居晋国都邑“晋”并不在唐叔初封之“唐”旧地,而是其新迁之都。

有此器为证,晋国在叔虞之子燮父时由初封的唐迁至新封的晋,可谓毋庸置疑。据《史记·晋世家》,成王之弟初封于唐,称唐叔,唐叔子燮称晋侯,晋侯子宁族称武侯,武侯子福称厉侯,厉侯子宜臼称靖侯,从唐叔至靖侯,凡历五世。其云:“靖侯已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可见,在司马迁时,晋国早期列侯的记载已零落无考,大概不仅列侯在位年数,其都城所在也无从详考了。若如顾炎武所言,叔虞始封之唐在翼城,“以至侯缙之灭,并在于翼”^②,则燮由唐迁翼,只是在唐叔旧封左近挪移,并未出唐叔固有封域,实无待于周王改封国号^③。尧公簋铭文云“王命唐伯侯于晋”,《竹书》云“唐迁于晋”,暗示晋去唐非近,唐、晋非一地,晋在初封的唐国封疆之外,故需周王重新封地赐号。唐叔之子燮改号“晋侯”,即因迁离故唐、移封晋地而改称。

那么,叔虞所封之“唐”,究在何地?

二、叔虞封唐

《春秋》《左传》记载了众多古地名,却从无提及晋境有名“唐”之地。《春秋》《左传》中提到的“唐”地,共有四处:

其一,成周之唐。《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周王子朝与敬王争位,王子朝入于王城,单子、刘子攻王子朝,“尹辛败刘师于唐”,杜预注云:“唐,周地。”此周地在周王城附近,不在晋地。

其二,楚地之唐。《左传》定公五年秋七月,楚人子期、子蒲灭唐,宣公十二年:“楚子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亦即此唐,杜预注:“唐,属楚之小国,义阳安昌县东南有上唐乡。”在今湖北省随州市西北唐县镇。此唐显然亦不在晋地^④。

其三,鲁西之唐。《春秋》隐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杜预注云:“高平方与县北有武唐亭。”在今山东省鱼台县。《春秋》桓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亦即此唐。

其四,齐境之唐。《春秋》昭公十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左传》云:“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因其众也。”经作“阳”,传作“唐”,字可通。北燕即后来的燕国。此前昭公三年,北燕伯因

① 朱凤瀚:《覲公簋与唐伯侯于晋》,《考古》2007年第3期。

②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1112页。

③ 1980年至2000年间,考古学者在山西翼城和曲沃两县间的天马-曲城遗址发现了数座西周时期的墓葬,墓葬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出现了多位晋侯的名字,证明这是一处西周时期的晋侯墓地,则晋国封地必去此墓地不远,可证晋国早期封地当在翼城。遗址出土了一件叔父鼎,属西周早期风格,内侧有铭文云“隹(唯)十又四月,王酈,大柶(簠)在成周。咸(咸)王,王乎殷厥土,齐叔父以鬯、衣、车、马、贝卣册。敢对王休,用乍(作)宝尊彝,其万年扬王光厥土。”(据李伯谦:《叔父方鼎铭文考释》,《文物》2001年第8期)铭文中“父”,很多学者读作“虞”,认为“叔父”即指唐叔虞,进而认为此鼎为唐叔虞自作器,据此断定天马-曲城遗址一带即晋祖唐叔虞初封之地。然而,已有学者指出,将“父”等同于“虞”字,证据不足。更重要的是,此铭既云“王乎殷厥土”,又云“其万年扬王光厥土”,器主叔父的身份显然是士,而唐叔虞作为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唐国之君,显然不会以士自居,故此器不可能为唐叔虞所作,故不能据以断定翼城晋都为唐叔虞所封。参见吴毅强《晋铜器铭文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7-105页)。

④ 《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韦昭注:“应、蔡、随、唐,皆姬姓也。”此“唐”即楚地之唐。

内乱而出奔于齐,至此年,齐人送其复国。《春秋》杜预注:“阳,即唐,燕别邑,中山有唐县。不言‘于燕’,未得国都。”杜预以阳或唐即西汉唐县。按,西汉唐县在今河北省唐县东北。河北的唐,不见于早期文献,杜预盖据后世地名相同而附会耳。此阳或唐,当为齐之边邑,位于燕、齐之间,《春秋》《左传》之所以不言纳北燕伯于燕,而言纳之于阳或唐,实因阳或唐为齐之边邑,其地近燕,齐人护送北燕伯归国,至此而止,随后由燕国迎驾者护送其君回都,《左传》所谓“因其众也”,即谓由燕众在唐邑迎接北燕伯护送归国,文义本极清晰,杜预未悉,误以阳或唐为燕邑,并附会于汉之唐县。春秋时,北燕在齐西北,两国以黄河为界,齐人护送燕君归国,必由齐国西境河上的津渡过河。春秋时,齐国西境滨河有高唐,高唐为齐西境重镇,燕君由齐渡河归国,必由高唐,此《左传》昭公十二年之“唐”,当即高唐。此为齐境之唐。

综观《春秋》《左传》所记诸“唐”地,无一在晋境者。唐为晋祖之初封,必为晋人宗庙所在,若其地在晋都附近,以《左传》记晋事之详,不当对近在咫尺的故国旧都一字不提。可见,唐叔虞所封之唐,很可能不在晋境,而当求诸晋境之外^①。

《春秋》《左传》所记四“唐”中,成周、楚地、齐境之唐,都不可能是唐叔初封之唐:成周之唐既在王城附近,显然不可能是叔虞封地;楚地之唐为国名,春秋早期其国犹存,显然不会是成王所灭之唐;至于齐国之唐,《左传》僖公四年载管仲之言曰:“昔召康公……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则黄河以东,皆属齐封,必非唐叔之封所在。然则成王所灭以封叔虞之唐国,很可能为鲁西之唐。

商的势力在东方,牧野之战,武王一举克商,但商的东方盟国势力犹存,故武王克商后,立“三监”以镇压殷商遗民。武王不久去世,成王尚幼,东方的殷商残余势力趁机携三监反叛,周公率师东征,苦战三年,叛乱始平,《逸周书·作雒》云:“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殁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②古书所记成王时期周人用兵皆在东方,《史记·周本纪》云:“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所言迁殷遗民、伐淮夷、残奄、迁其君于薄姑,锋芒所向,莫非东土,故太史公总括之曰“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成王时期为剪除殷商势力,一心经营东方,实无暇顾及对北方晋地的经略。

值得注意的是,《今本竹书纪年》次“王师灭唐”于伐奄、灭薄姑、伐淮夷、营洛邑、诸侯来朝之后的成王八年,同年成王命鲁侯、齐侯,迁庶殷于鲁,唐国当在此时被灭,则其地必在东方。经过成王、周公、召公三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商的东方势力被先后剿灭,克商大业才最终完成,其他一些东方小国则成为齐、鲁的附庸,被纳入了周的统治体系之中。成王灭掉东方的唐国,封其弟叔虞于其地为唐侯,其用意自与封太公于齐、封伯禽于鲁、封康叔于卫一样,皆为镇压东方殷商残余势力。至成、康之际,殷商余烬已被彻底扑灭,东方的威胁不复存在,齐、鲁、卫三国的力量足以镇守东土,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成王营建成周,定鼎洛邑,洛邑成为周之东都。康王继位后,移封唐叔虞之子燮于洛邑以北的晋地,并因此重新赐其号为“晋侯”,其意盖旨在拱卫成周,一为监视聚居洛邑的殷商遗民,二为防

① 商代青铜器有族氏铭文“唐”,表明唐为商代古国。殷墟卜辞中亦有“唐”地,多为武丁时期卜辞,卜辞曰“呼征唐”“王狩唐”“在唐麓”“使人往于唐”“唐来四十”“作大邑于唐”,商王在唐田猎,一度驻扎于唐,甚至在唐建筑大邑,唐经常向商王纳贡龟甲,可见唐与殷商的关系十分密切。另有卜辞云“唐子伐”“侯唐”,商代青铜器中,有一套四件铭有“唐子祖乙”器,唐的首领称“唐子”,或称为“侯”,可见唐在商代为方国。这一商代的唐国可能就是灭于周初、封于叔虞的唐(参见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98—299页)。

②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3—254页。

御北方戎狄入侵,同时,晋侯与成周分居黄河南北两岸,以南北夹持之势,扼守东方入关通道,守卫位于关中的宗周王朝^①。

成王所灭之唐国当即鲁西的唐邑所在,此可由数见史书记载的“唐杜氏”的历史得以证明。

唐杜氏为位于宗周京畿附近的一个附庸小国,为成王所灭唐国的遗民所徙居。《今本竹书纪年》谓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王国维《疏证》引《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之言“在周为唐杜氏”为该条之出处。《左传》原文为: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

杜预注云:“唐、杜,二国名。殷末,豕韦国于唐,周成王灭唐,迁之于杜,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晋,四世及士会,食邑于范氏。杜,今京兆杜县。”杜预分唐、杜为二国,显系误解,范宣子自承唐杜氏之后,“唐杜氏”只能是一国或一族之名。杜预在世时,正逢汲冢竹书问世,曾亲见竹书,他说周成王迁唐于杜,与《今本竹书》合,或即本自汲冢竹书。唐国迁杜,故其后人以“唐杜氏”自称,意谓其族为迁于杜邑的唐氏,正与后世名门望族言地望,往往标榜以“清河崔氏”“琅琊王氏”“陇西李氏”同理。范宣子将唐杜氏一族追溯到陶唐氏、御龙氏、豕韦氏,可见唐国历史的源远流长。范宣子称唐杜氏“在商为豕韦氏”,《国语·郑语》载史伯之言,以大彭、豕韦并为商伯,并称彭祖、豕韦皆为彭姓,可见豕韦氏旧墟必与彭国相近,而大彭旧墟在今徐州,其地正与鲁国相接。唐杜氏既为豕韦氏之后,则其故土必去鲁地不远。

范氏之祖唐杜氏出自东方豕韦氏,原居于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晋国史官蔡墨所述刘累御龙的传说亦可证:

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飧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陶唐氏之后刘累接替豕韦氏之职,为夏后孔甲御龙,赐氏曰御龙氏,后因惧罪迁于鲁县。关于鲁县之所在,杜预注云:“鲁县,今鲁阳也。”鲁阳指鲁阳县,西汉所立,其地在今河南省鲁山县,杜注当本自《汉书·地理志》,《地理志》于南阳郡鲁阳县下自注云:“有鲁山,古鲁县,御龙氏所迁。”然而遍检载籍,鲁阳县并无“鲁县”旧名,班固之说当系因地名偶同而据《左传》附会^②。汉代确有鲁县,见《地理志》,为鲁国属县,治在曲阜。

蔡墨所言鲁县当然不会是汉代的鲁县。蔡墨为春秋时人,而其所谓“鲁县”,以“县”为名,容易让人以县制晚起而怀疑《左传》这一段记载的可靠性^③。实际上,春秋时,楚、秦、晋国等大国已多置县。

①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之言云:“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杜预注:“熊绎,楚始封君;王孙牟,卫康叔子康伯;燮父,晋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四国,齐、晋、鲁、卫;分珍宝之器。”燮为唐叔虞之子,他与吕伋、王孙牟、伯禽并称,三人的封国齐、卫、鲁皆在东方,楚人原本亦居东方,则燮之封国,亦当在东方。据楚灵王此语,可知燮与齐、卫、鲁之君皆曾参与康王对东方的征讨行动,康王继承周公、成王的东方经略,最终平定东方,东方既平,燮父当在此后由其在东方的原封地而移封于晋,改称晋侯。前引《古本竹书纪年》云:“晋侯筑宫而美,康王使让之。”晋侯筑造宫室,当即发生于移封之后。

② 鲁阳县非古鲁县,但鲁阳因在鲁山之阳而得名,鲁山之名或与鲁国有关。《春秋》桓公元年:“郑伯请以璧假许田。”《公羊传》曰:“许田者何?鲁朝宿之邑也。诸侯时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许田为鲁国在成周附近的朝宿邑,为鲁侯朝见周王临时驻扎之所。田邑近许国,故鲁人称之为“许田”,其地属鲁,则当地人当称之为“鲁田”(犹今各省驻京办事处,京城人称之为“各省之名,本省官员称之为省驻京办)。鲁山即今河南鲁山县,许田在今许昌市,两地相去不远,鲁山或因其临近鲁国朝宿邑而得名。傅斯年《大东小东说》认为鲁山县为鲁之初封,故名鲁山,曲阜则为后来所迁,其说无据,不如认为鲁山得名于鲁之朝宿邑更合乎情理。参见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第三卷,第54—64页。

③ 顾颉刚先生认为《左传》以鲁县为夏代的县,而夏代不当有县,故怀疑此鲁县乃至整个刘累豢龙的传说都是刘歆为了替王莽篡汉造舆论而伪窜。按,说刘歆伪窜《左传》,并无实据。《左传》蔡墨谓夏代的刘累迁于鲁县,只是以今地言古事,此为述史之惯例,并不意味着鲁县为夏代之县,故不当以夏代无县制而否定这段传说的真实性和鲁县的存在。参见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县》,《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五,第231—274页。

秦、楚、晋等大国,吞并小国,其地或与本土悬隔,即设为县,或以为功臣封邑,或设官吏驻守^①。——蔡墨为晋人,他称鲁为“县”,表明其当为晋县,名县为“鲁”,表明其地在鲁,则鲁县当为春秋时晋国设于鲁国附近的县。

那么,晋国这片位于鲁地、名为“鲁县”的飞地,是何来历?蔡墨云陶唐氏之后刘累“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意谓范氏祖先出自陶唐氏,鲁县即范氏祖先所居之地,则鲁县之所在和鲁县之来历,可由范氏的历史求之。

范氏为晋国六卿世族之一,范氏一族出自西周唐杜氏,周宣王杀杜伯,杜伯之子隰叔流亡晋国,其子舆为晋国理官(法官),故以“士”为氏,四世至于士会,士会有功,晋先后封士会于随、范二邑,故称随氏,又称范氏,士会始任正卿,即范武子,范宣子士匄为范武子之孙^②。范氏因封于范而为范氏,范邑在今河南省范县东,与山东省梁山县毗邻,《孟子·尽心上》云:“孟子自范之齐”,即此范邑,西汉置为范县。

顾栋高认为士会封范邑,当在晋人灭赤狄之族潞氏(《春秋》宣公十五年)、甲氏和留吁(《春秋》宣公十六年)之时^③。范在齐、卫之间,西周和春秋早期当属于卫。《春秋》闵公二年:“十有二月,狄入卫。”狄灭卫,卫人迁于曹。清华简《系年》云:“周惠王立十又七年,赤翟王留吁起师伐卫,大败卫师于囿,幽侯灭焉,翟遂居卫。”^④可见侵占卫地的狄人为留吁一族,范邑亦当在此时沦入留吁之手。晋灭甲氏、留吁之役,士会为主帅,《左传》宣公十六年:“春,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潞辰。三月,献狄俘。晋侯,请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范邑当在此时归于晋人之手,士会封范邑,当即在此时。范邑在今山东梁山县,其地在齐、鲁、卫之间,与晋国本土相去甚远,或认为春秋中叶晋人拓地当不至于此,故怀疑士会所封非此范邑。其实,范邑为范氏封邑,《左传》即有明证。据《左传》记载,鲁定、哀公之际,范氏后人范吉射因权争失败逃到齐、卫之间的范邑,可证士会所封的范邑必即今梁山县的范邑^⑤。不过,顾栋高认为晋国在灭狄人潞氏、甲氏、留吁后,原属卫国而被狄人所占的土地悉归于晋,这意味着晋境拓地至于位于齐国西境,却未免夸大了当时晋国的疆域。卫国在鲁僖公三十一年迁于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市)后,终春秋之世,一直都于帝丘,介于晋、齐之间,若果如顾氏之说,晋人在春秋中叶即辟地至齐国西境,将置卫国于何地?实际上,春秋中叶晋国虽然不可能拓地至梁山境,却不妨在此地占有一片飞地,以当时晋国的势力及其与鲁、卫、宋诸国的结盟关系,晋国完全有能力乘扫灭赤狄之机,在齐、鲁、卫、宋之间占据一片飞地,封给像范氏这样的强族而据为己有。范邑不与晋境接壤,这一点由《春秋》定、哀之际范氏后人范吉射在晋国权争中失败而逃到范邑孤守并得到齐、鲁、宋、卫诸国的鼎力支持即可看出。正因范邑为孤悬于晋国本土之外的飞地,且近齐国,故后来为齐国所并。

范邑孤悬于晋国本土之外,而范武子接受其为自己的封地,想来正跟此地原本就是范氏先祖的发祥地有关。士会率师灭赤狄之后,晋国封范氏于此,对于晋国,是在东土齐、鲁、宋、卫之间扎下一

① 参见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六,第44页;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县》,《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五,第231—274页。

② 《国语·晋语》载范宣子与大夫和氏争田,问计于家臣瞿裕,瞿裕对曰:“昔隰叔子违周难于晋国,生子舆,为理,以正于朝,朝无奸官;为司空,以正于国,国无败绩。世及武子,佐文、襄为诸侯,诸侯无二心。及为卿,以辅成、景,军无败政。及为成师,居太傅,端刑法,缉训典,国无奸民,后之人可则,是以受随、范。”据瞿裕之言,范氏受封范邑,是在范武子时。《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杜预注谓唐杜氏之后隰叔奔晋,四世及士会(范武子),食邑于范氏,当即据《晋语》为说。

③ 顾栋高:《范为士会封邑考》,《春秋大事表》卷三九,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197—2198页。

④ “赤翟王留吁”,“留吁”二字,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释为“𨵿虐”,简文前一字从中从古文“酉”,后一字从虎从口,《春秋》宣公十六年云:“春,王正月,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杜预注:“甲氏、留吁,赤狄别种。”留与酉、吁与虎,音并相通,“𨵿虐”当即“留吁”。参见张晶颖:《清华简新见文字现象整理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48页。

⑤ 《左传》定公十四年,“齐侯,宋公,会于洮,范氏故也”;哀公元年,“齐侯,卫侯,会于干侯,救范氏也”;哀公二年,“秋,八月,齐人输范氏粟”等,即记其事。

个据点,藉之可以牵制齐国,而对于范氏,则是荣归故土、光复旧物,范武子之孙范宣子炫耀范氏家世历史悠久,死而不朽,盖即缘此而发。

《左传》鲁昭公二十九年(前513)晋史官蔡墨称范氏所居为鲁县,是在鲁宣公十六年(前594)士会率晋师灭留吁之后,蔡墨所说的鲁县,当即指范邑。“县”者悬也,因范邑与晋境悬隔,其地近鲁,故谓之“鲁县”。——增渊龙夫认为,春秋时代楚、晋等强国的县,大都是灭亡小国之后改组而成,故多位于各国边地,县的长官尽管由国君任命,但任命的依然是势力强大的世族,因此,春秋时期的县既是国君的直辖地,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世族的私属领地^①。范邑其地,“范”当为其旧名,因其为士会一族所世袭,故士会一族得以“范”为氏,因其在名义上属于晋国国君的直辖地,而其地在鲁,故得称为“鲁县”。

综合《左传》关于唐杜氏和范氏源流的记载,可见范氏确为源远流长的古国旧族,范宣子以“不朽”标榜其族,可谓名副其实。范氏为唐国之后,据范氏一族的世系源流和迁居之地,又足以证明范氏祖居鲁地,鲁地原有唐国。据此可以为唐国一族在西周至春秋的变迁勾画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唐国原为东方古国,春秋时位于曲阜以西今鱼台县的唐邑当即其古墟所在;周成王时,周公东征商奄,唐国亦同时被灭,周迁其遗民至宗周附近的杜邑,是为唐杜氏;周成王将鲁地的唐国故地封给叔虞,称为唐叔,是为周初的唐国;周康王时,东土初平,唐叔虞之子移封于晋,是为晋侯;周宣王杀唐杜氏之君杜伯,杜伯之子隰叔逃往晋国,四世至于士会,鲁宣公十六年,士会率师伐灭占据卫土的赤狄,晋封士会于卫土范邑,以继唐国之后^②,故称范氏,而晋人则称其地为鲁县。唐国,这一东方古国的香火,竟借去而复归的范氏一脉而得以延续。

西周覆亡,周社东徙,居于杜邑的唐杜氏并未随周东去,而是留在关中。又过了数十年,至秦宁公三年(前713),唐杜氏才被秦所灭,《史记·秦本纪》云秦宁公“二年,公徙居平阳,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集解》引徐广云:“荡音汤。社,一作杜。”则“荡社”当作“汤杜”,“汤”“唐”通,“荡杜”即唐杜氏。据此,唐杜氏之国又称“亳”,杜主则称“亳王”。《史记·封禅书》记述雍地诸祀云:“于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营庙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据上下文,“社”显然亦系“杜”字之讹,《索隐》引徐广云:“京兆杜县有亳亭,则‘社’字误,合作‘于杜亳’。”^③杜亳亦即唐杜。“唐杜”之称“杜亳”,耐人寻味。众所周知,“亳”为汤都之称,商起于东土,汤亳也只能在东土,杜伯之国称“亳”,或是周初唐国迁杜时由东方故土携来的旧名,或者是周人东迁洛阳之后,杜主意图拥兵复国(故自称为“亳王”),因其故土旧都之名命名其国。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足以说明唐国与亳的关系甚为密切。综合以上所述,不仅可以证明唐国在鲁,亦说明亳在鲁。实际上,曲阜有亳社,屡见《春秋》《左传》记载。社为土地之象征,社之所在,即封土所在,曲阜有亳社,即足以证明曲阜为亳之故土,至于曲阜之亳是否即为商汤所都,则另当别论^④。

明白了叔虞所封的唐国原在鲁地,有助于我们理解晋公盘铭文关于唐叔封地的说法^⑤。晋公盘系某代晋公为嫁长女孟姬于楚国所作媵器,开头一段追述始祖唐公辅佐武王征伐天下而因功受封: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晋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毅畏百蛮,广辟四方,至于

① 增渊龙夫:《先秦时代的封建与郡县》,《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87—366页;杨宽:《春秋时期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杨宽古史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1—76页。

② 范县在鱼台县(春秋时唐邑所在)西北二百里左右。

③ 《史记》卷五,第181页;《史记》卷二八,第1376页。“杜”“亳”二字间不应点断。

④ 《古本竹书纪年》谓商王南庚居庇,迁于奄;阳甲即位,居奄;盘庚即位居奄,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奄为商人旧都,故商人迁殷后,奄地犹为商人势力范围,称为商奄。武王克商,未及灭奄,武王死后,三监畔周,商奄作乱,周公东征践奄,商奄遗民则归于鲁,《左传·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鲁既曾为商奄所宅,曲阜的亳社当即商亳。

⑤ 晋公盘与见于清人著录的晋公盂为同时所作,铭文相同,盘铭更为完整,郭沫若、杨树达、唐兰、李学勤等人对盂铭皆有论考。晋公盘系近年因盗掘而流失海外的新出土文物,2019年追回。晋公盘铭文,见吴镇烽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08—312页。

丕廷,莫不秉敬。王命唐公,建宅京师,君百姓作邦。^①

唐公即唐叔虞。该文中出现了两个地名,一为丕廷,一为京师。

“广辟四方,至于丕廷”,意为唐公辅佐武王征伐四方,至于丕廷这个地方。“丕”训大,“丕廷”即“大廷”。“大廷”为地名,郭沫若、唐兰、马承源等都认为即史书所载大庭氏之国^②。《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夏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皆发生火灾,“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杜预注云:“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城内。”叔虞随武王征伐所至的大廷,当即鲁地的大庭氏。

铭文接着说“王命唐公,建宅京师,君百姓作邦”,封唐公于“京师”,则“京师”所在,当即“夏墟”。“京师”所指,释者所言不一。京师为周王封叔虞建国之地,显然不会指周京^③。“京师”原文作“京自”,甲骨文中常见地名后缀以“自”字的用法,铭文“京自”盖指名为“京”的高阜之地。上文云“至于丕廷”,丕廷(大庭氏)在鲁,而周时鲁地附近正有名“京”之地。《诗经·鄘风·定之方中》云:“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毛传》云:“《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所言即《春秋》闵公二年狄入卫、卫人迁曹之事。漕即曹,在今山东定陶县。诗所谓“楚”“京”“景”皆丘墟名,《水经·济水注》云:“荷水分济于定陶东北,……北径己氏县故城西,又北径景山东,《卫诗》所谓‘景山与京’者也。毛公曰:‘景山,大山也。’又北径楚丘城西,《郡国志》曰:成武县有楚丘亭。杜预云:楚丘在成武县西南。卫懿公为狄所灭,卫文公东徙渡河,野处曹邑,齐桓公城楚丘以迁之。……即《诗》所谓‘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④景山、楚丘均在定陶附近,春秋时属宋地,楚丘在今成武县,成武县在曲阜西南二百里。《水经注》虽未言京山所在,但京山必在曲阜、成武之间。成武以东百余里,即为今鱼台县,其地春秋时名为唐,如上所述,此唐当即叔虞所封之唐,即周人所灭唐国所在。然则,晋公盘铭文所言叔虞初建国之“京师”,盖即《鄘风》之京,其地在今成武、鱼台之间,可证叔虞所封的夏墟不在河东,而在鲁西^⑤。

三、三星在天

《史记·封禅书》关于唐杜氏的记载还说明,这一由鲁地迁于关中杜邑的唐国,与《左传》所载成王灭以封叔虞的唐国,有着相同的宗教传统,两者皆主参星之祀。

《史记·封禅书》记述秦始皇整顿祀典,谓“于杜亳有三杜主之祠、寿星祠”,《索隐》云:“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寿。”^⑥寿星一名老人星,即西方星图中的船底座 α 星(Canopus α)。老人星非常明亮,为全天恒星中仅次于天狼星的第二大亮星(视星等-0.72),不过,老人星尽管明亮,但赤纬甚低(当前赤纬为 $-52^{\circ}41'44''$),位置非常偏南,因此在北方中原地区很难见到,一年之中只有有限的几天能看到它低低地升起于正南方的地平线上。正因为老人星只能见于正南方,而不可能在其他方位出现,故古人据其出现的方位以定南极,从而名之为“南极老人星”。后世称寿星神为南极仙翁,即源于此。

① 释文参考张崇礼《晋公盘铭文补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4年7月3日)。

② 吴毅强:《晋铜器铭文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50页。

③ 铭文“京师”,李学勤认为指宗周镐京,“武王命唐叔宅于镐京,事在封唐之前,也与分封无涉”(李学勤:《晋公盂的几个问题》,《出土文献研究》第一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既称“唐叔”,则显然是在封唐之后,而宗周为周王所居,不可能再封叔虞于其地“君百姓作邦”,李氏之说必不可通。

④ 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4页。

⑤ 1957年山东长清县南兴河北岸出土99件商代青铜器,其中有一件带“京”字徽铭的铜器。另外,《山东金文集存》收入有同样“京”字徽铭者六件,其中一件注明为“民国十六年丁卯济南出土”,其余五件“虽不详其出土何处,以铸铭校之,自是一家眷属也。”高广仁、邵望平认为“京”可能在济南一带立国(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48页)。鲁西因地处黄河下游,水灾频发,故先民多丘居,丘名亦即国名。《鄘风·定之方中》的“楚丘”为楚墟所在,与之并列的“京”很可能就是京国的古城。长清发现带“京”字族徽的青铜器,说明京国离长清不远。

⑥ 《史记》卷二八,第1375-1376页。

老人星的出没规律还有一个重要特点,老人星赤经(当前赤经为 6h24m)与太阳赤经相差约 90°,这决定了老人星只有在每年的春、秋分前后,在太阳升起之前或降落之后才能看到,也就是说,春分前后,当黄昏之际日落西山时,老人星正好升起,秋分前后,在拂晓之际日出东方之前,老人星也正好升起,而在其他日期里,当老人星升起时,太阳或尚未降落,或已经升起,老人星的星光被阳光所掩而无法见到。正因为而在北方中原地区,一年当中,只有在春分之夕和秋分之晓这两个时间点才能看到老人星,因此,根据对老人星的观察,不仅可以据其所在方位定南极,为辨方正位确定基准,还可以据其出现的时间判断春、秋分二仲的日期,为观象授时提供节气基准。正是由于注意到了老人星出没的这一规律性,所以古人非常关注对老人星的观察。由于在上古时期,老人星在秋分拂晓的可见性好于其在春分黄昏的可见性(这一点可由天文计算证明),故古人对老人星的观察常在秋分拂晓进行,故《史记·天官书》云:“南极老人……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

实际上,老人星之得名为老人星或寿星^①,正与“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有关。秋分正当秋收之际,古人于秋收之后,举行丰收庆典,并以新收获的谷物奉献天地群神和列祖列宗,是为秋尝,即所谓尝新节。秋尝仪式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向群神和祖先祈求寿考,《诗经》中的秋尝之诗即可为证。如《小雅·楚茨》云:

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又如《小雅·信南山》云:“疆场翼翼,黍稷彧彧。曾孙之穡,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鲁颂·閟宫》云:“秋而载尝,夏而福衡。白牡骍刚,牺尊将将。毛炰膾羹,笾豆大房。万舞洋洋,孝孙有庆。俾尔炽而昌,俾尔寿而臧。”《商颂·烈祖》云:“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绥我眉寿,黄耇无疆。……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飨,降福无疆。顾予烝尝,汤孙之将。”所述皆为秋尝庆典,而均以向先祖群神祈求眉寿为主要诉求。秋尝以祈寿,故在秋尝之际,古人会同时举行敬老之礼,《吕氏春秋·八月纪》云:“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汉代即推行过仲秋养老的习俗,《后汉书·礼仪志》云:“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国都南郊老人庙。”^②古人于仲秋之月举行秋尝祈寿和敬长养老之礼,而老人星恰于此时升起于南极,故此星被顺理成章地作为仲秋之月的标志而得名为老人星或寿星。《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表明,古人确实把祀老人星与养老风俗联系起来。后世的重阳敬老节,就是从上古秋尝养老习俗演变而来的。

华夏先民观察老人星的历史十分久远。《大戴礼记·夏小正》:“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传云:“鞠者何?星名也。鞠则见者,岁再见尔。”鞠为星名,但鞠星究为何星?前人却众说纷纭,先后被指为鞠星的有虚、白、天钱、天钩、匏瓜、禄、北落师门、危、室等^③,皆属瞎猜,唯清人王筠《夏小正正义》云:“窃亿鞠星盖老人星也,是星近南极,秋分之曙见于丙,春分之夕见于丁,一岁仅再见。”^④得其正解。老人星在一年当中唯于春分之夕、秋分之晓前后的几天内才能见到,一年能见到两次,故曰“岁再见”。老人星在参星下方(南方),平时很难见到,只有当参星升到正南方最高点时,老人星方得以

① 后人常将老人星称为寿星,但早期天文学中,寿星并非指老人星,《尔雅·释天》云:“寿星,角、亢也。”《汉书·地理志》云:“自东井六度至亢六度,谓之寿星之次。”寿星非星宿之名,而是星次之称。古人将周天二十八宿分为十二次,即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其中寿星之次包括角、亢二宿,在方位上对应于东南辰位。《国语·晋语》云:“岁在寿星及鹑尾。”寿星与鹑尾分别指角、亢二宿和翼、轸二宿。角、亢二宿本身皆无象征长寿的意味,角、亢之被合称为寿星,亦当跟老人星一样,与秋尝庆典有关。上古时期,秋分前后,当老人星在拂晓时分出现于南极时,角、亢作为东方苍龙的首二宿,正好升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空,此时正是举行秋尝祈寿庆典的时候,故角、亢所在星次,被命名为寿星之次。

② 《续汉书》志第五《礼仪中》,《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24页。

③ 胡铁珠:《夏小正星象年代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9卷第3期,2000年。

④ 王筠:《夏小正正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0页。

随之在正南方崭露头角,《夏小正》云“鞠则见,初昏参中”,即谓当黄昏参星升上正南方(中)之时,鞠星才出现,其义甚明,鞠星只能是老人星^①。《夏小正》中保存了非常古老的天文知识,其书以“夏”为名,表明古人相信此书源于夏代,可见古人对鞠星观察之久远。

鞠谓老人星,《山海经》亦有力证。《大荒东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②《大荒经》所载四方风和四方神名,亦见于殷墟卜辞,可见其渊源之古老。东方之神折丹“处东极”,鞠陵于天之山又名“东极离瞀”,表明鞠陵于天之山位于正东方,则此山实为春、秋分之日的日出之山。山名“鞠陵于天”,意味深长。陵者,升也,“陵于天”即升于天,唯日、月、星可升于天,则“鞠”当为星名。鞠陵于天之山为春、秋分的日出之山,意味着鞠星是在春、秋分之际升起的,可见,“鞠”必指老人星无疑。古人将春、秋分的东方日出之山命名为“鞠陵于天”,表明古人对老人星的观察是在秋分拂晓进行的(若在春分黄昏观察,则当称位于西方的春、秋分日落之山为“鞠陵于天”)。总之,《大荒经》“鞠陵于天”一条表明:(1)鞠即老人星;(2)古人主要在秋分之晓而非春分之夕观察老人星,说明老人星在秋分拂晓的可见性好于春分黄昏;(3)老人星与四方风名并见于《大荒经》,而四方风名尚见于殷墟卜辞,则借助观察老人星以确定春、秋分的办法,可能追溯到商代。可见,《大荒经》的记载与《夏小正》的记载遥相呼应。

老人星纬度极低,因此在北方中原地区,可观察到老人星的时间甚短,一年之中,只有在春分前后的黄昏和秋分前后的拂晓,老人星才从南方地平线上低低地升起,升起不久即坠入地平线下不复可见。老人星不容易观察,但与老人星相邻的参宿却十分醒目,故古人很自然会借助参星以观察老人星。当参宿升上南中天时,老人星必然会随之升上地平线,因此,每当春昏或秋晓,只要看到参宿到了正南方,就很容易在参宿下方(南方)的地平线附近捕捉到老人星的身影,《夏小正》所谓“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说的就是老人星和参星同见南方的现象。既然参星与老人星形影不离,以参星在古人观象授时和宗教神话中的重要地位,唐杜氏既祠老人星,必不会置参星于不顾,《史记·封禅书》云“于杜亳有三杜主之祠、寿星祠”,“三杜主”一说颇为费解,前人对此均无解说,区区杜邑一地,何以竟至于有三处杜主祀?“三”“参”音义俱同,参星共有三星,颇疑此处的“三”字即指参星,《封禅书》此句当断为“于杜亳,有三、杜主之祠、寿星祠”。

《夏小正》和《大荒经》关于鞠星的记载表明,华夏先民观察和祭祀老人星的历史十分久远。神祠历年愈久,民愈虔信,其神愈灵,故古人虽灭人之国,却不废其祀,秦人祀寿星于杜县,表明杜县寿星祠必有悠久的历史,必为唐杜氏世代所守之神祠。唐杜氏世代祠祀而不辍的寿星之神,必为唐国遗民被迫西迁时从东方故土携来。子产称唐人“服事夏、商”,则唐当为一个由夏入商的古老方国,至周公东征时始为周所灭,唐人对参星和老人星的祭祀亦必定经历夏商,源远流长。

实际上,唐国与参星之间的渊源,《诗经》中即有明证,《唐风》为唐国之诗,其中《绸缪》一篇,即对参星再三致意: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邂逅相遇,一见钟情,恋人良宵苦短,依依不舍之际,时间已悄然流逝,抬头看天,三星已从东方转至

^① 认识到“鞠”指老人星,则一直悬而未决的《夏小正》岁首问题也迎刃而解。由于老人星只有在春、秋分的昏、晓可见,《夏小正》将“鞠则见,初昏参中”置于正月,足见《夏小正》是以春分所在月即后来夏历的仲春之月为岁首的。此外,由于老人星具有其他星象所不具备的准确的时空定点作用,因此,《夏小正》“鞠则见”的记载,给《夏小正》年代学问题的解决,无疑提供了有力的线索。

^② 本文所引《山海经》及郭璞注,均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影印《宋本山海经》为据,下文凡引此书,不复出注。

中天,毛传云:“三星,参也。”^①该诗不仅可以证明唐人对参星的关注,而且证明唐人确称参宿为三星^②。

《诗经·唐风》为唐国之诗,古人因相信叔虞所封之唐在河东,故认为《唐风》之唐即河东唐国,班固《汉书·地理志》认为太原郡晋阳县即“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郑玄《诗谱·唐风》云:“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今既知周成王所灭、叔虞所封的唐国不在河东,而在鲁地,则知《唐风》所采,当皆为鲁地之诗,而无关乎河东。由此一例,也提醒我们,《诗经》国风十五国,或为周初封国地理,而前人言《诗经》地理往往据东周、春秋诸侯地理为说,由此可见,传统的《诗经》地理学实有重新审视之必要。这是题外话,且置之不论。

回到唐祀参星的问题。《左传》昭公十五年周景王对晋籍谈说周初分封时,周王赐给唐叔密须之鼓和大路、阙巩之甲,“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直称唐叔所封之地为“参虚”,可见在周人观念中,唐国即参星之神所凭依,这意味着唐国当是参星神祀所在。

《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索隐》云:“寿丘,地名,黄帝生处。”《集解》引皇甫谧云:“在鲁东门之北。”^③则鲁都曲阜有寿丘,此丘以“寿”为名,或与对南极寿翁老人星的祭祀有关。

据《史记索隐》之说,黄帝生于寿丘,这当是曲阜当地的传说,寿丘当与黄帝崇拜有关。《大戴礼记·帝系》云:“黄帝居轩辕之丘。”《五帝德》则说黄帝名轩辕。轩辕之丘,最初出自《山海经》,《大荒西经》《海外西经》均载有轩辕之丘、轩辕之台,与轩辕之丘相邻又有轩辕之国。《海外西经》云:

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

《大荒西经》云:

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大荒之中,有龙山,日月所入。有三泽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也。

又云:

有弇州之山,五彩之鸟仰天,名曰鸣鸟。爰有百乐歌儻之风。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

两篇所言为同一场景,轩辕之丘即轩辕之台。《海内西经》《大荒西经》均将轩辕之台与长寿者联系起来,所谓“不寿者乃八百岁”,说明其台与祈寿之祀有关,则轩辕之台亦即寿丘,轩辕为黄帝之号,可见,黄帝生于寿丘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实际上,《大荒经》《海外经》记载的这座轩辕之台就在曲阜附近。前人因见《大荒经》《海外经》所勾勒的版图四面环海,且记载了众多海外方国、殊方异物,都把其地域范围想象得非常辽远。实际上,《大荒经》的地域范围不出今山东省版图,其中所记地理景观和方国,很多可在山东古史地理上得以印证,如北齐之国、河济所入、先槛大逢之山、大人之国、附禺之山、羲和之国、盖犹之山、苍梧之山等等,其所谓“北海”,即渤海,“东海”和“南海”即黄海,所谓“西海”,即位于鲁西的大野泽。对此,拙

① 毛传云:“三星,参也。”郑玄笺云:“三星谓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妇父子之象,又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为候焉。”毛、郑之说不同。笔者在《失落的天书》一书中论及古人大火记时制度时,曾引此诗为证,从《郑笺》之说,以该诗“三星”为心宿。今综合参证,宜从《毛传》,以三星为参宿。

② 《诗经·鲁颂·閟宫》云:“三寿作朋,如冈如陵。”毛传:“寿,考也。”“三寿”之义,其说不一,郑玄释为“三卿”,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释为“三老”。“三寿”屡见两周金文,如宗周钟铭:“福余顺孙,参寿唯利”,者盂钟铭:“于其皇祖皇考,若召公寿,若参寿”,曷仲解铭:“介三寿懿德万年”(金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三寿”为周代祝嘏祈寿习语。三卿、三老均为官职名,无关乎寿考,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云:“‘若参寿’者,谓寿比参星。典籍及其它铭刻作‘三寿’者亦此意,旧未得其解。”(《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54页)参星本身并无长寿之义,以参星寓意长寿,意味着古人必以参星与老人星同观,“三寿”“参寿”合指参星与老人星。

③ 《史记》卷一,第32—33页。

文《四海之内:〈大荒经〉地域范围考》^①俱有详论,兹不赘述。《大荒西经》所记场景多在西海之滨,当为鲁西大野泽周边的地理和方国,上引《大荒西经》关于轩辕之台和轩辕之国的一段记述,即在鲁西,其证有三:第一,《大荒西经》的记述表明,轩辕之山和轩辕之国与“西海隅”相邻,西海即大野泽,说明轩辕之山当去大野泽不远;第二,轩辕之国又与“弇州之山”相邻,“弇”“兗”通,“弇州”盖即兗州,《禹贡》云“济、河惟兗州”,大野泽正在河、济之间,属兗州;第三,轩辕之台与三淖相邻,三淖为“昆吾之所食”,盖为昆吾之神所栖,《左传》哀公十七年:“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虚。”《大戴礼记·帝系》云:“昆吾者,卫氏也。”卫地有昆吾之墟,昆吾为卫氏所出,《吕氏春秋·有始》云:“河济之间为兗州,卫也。”昆吾所食的三淖当在兗州之域。由上所述,足见轩辕之台、轩辕之国在鲁西河济之间、大野泽周边,而曲阜就在大野泽以东一百余里。总之,《大荒西经》轩辕之国“不寿者八百岁”的记述与曲阜寿丘相互印证,说明上古曲阜所在的鲁西一带是寿星崇拜的中心所在,这为鲁地为参星之墟、唐国故地提供了又一个有力的佐证,进而证明叔虞所封的唐即鲁西之唐。

综上所述,唐杜氏与老人星、参星之祀的渊源,证明唐杜氏与子产所讲传说中“主参”的唐国有着相同的宗教传统,叔虞所封的唐或“参虚”即唐杜氏在鲁地的故墟,老人星、参星崇拜当是唐这个东方古国世代相传的古老风俗,这再一次让我们回到了子产讲述的“参商不相见”的故事。

四、鲁西大夏

子产为晋侯讲述唐人主参、居于大夏的掌故,旨在说明晋国初祖叔虞封唐、称唐叔的来历,前人均据此认为大夏在河东,并因而断定夏墟在河东。《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服虔注云:“大夏在汾、浹之间。”(《史记·郑世家》集解引)杜预注云:“大夏,今晋阳县。”说虽不同,却均以大夏为河东之地。实际上,这个故事恰恰证明,晋祖唐叔所封的唐国、唐国所因的大夏,不可能去商丘太远,因此不可能在晋地,而只能在东方。在天文学内涵之外,这一传说的还蕴含了明确的地理学讯息。

传说故事最初唯凭口耳相传,大多与本乡本土的地理、风俗、地名等有关,因此,传说中的地理知识所能涵盖的空间广度大都是十分有限的,不会超出本乡本土及其周边地区,这也就意味着,出现在同一个传说中的地名,必定相去不远。子产讲述的故事中,提到“商丘”和“大夏”两个地名,大夏与商丘肯定不会相距太远,也就是说,大夏之所在,只能求之于商丘附近、鲁豫之间,而不当求诸千里之外的山西。

子产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祝佗称叔虞“封于夏虚”,两说相关而有别。唐人“服事夏、商”,说明唐是一个历经夏、商一直存在的古国,它与夏王朝并存,则其所因的大夏,不可能是夏墟,至周初叔虞封唐之时,则夏亡已久,由于唐人原本与夏人毗邻而居,且系夏之属国,故周人径称其地为“夏虚”。是知“夏虚”与“大夏”,其地虽同,其义则别,“大夏”盖为地域之称,“夏虚”则为都邑之名,夏王朝之称“夏”,当因其都于大夏之地。夏墟在鲁西,则“大夏”其地必在鲁西。

实际上,其他文献中记载,也可以证明“大夏”就在鲁西。“大夏”作为地名,除《左传》外,数见战国秦汉之书,今按其年代先后,列举如下:

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管子·封禅》,《史记·齐太公世家》、《封禅书》同,《国语·齐语》作“悬车束马,逾太行与辟耳之溪,拘夏,西服流沙、西吴”。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吕氏春秋·古乐》)

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鱣鲔之醢,大夏之盐……(《吕氏春秋·本味》)

^① 刘宗迪:《四海之内:〈大荒经〉地域范围考》,《文史哲》2018年第6期。

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吕氏春秋·为欲》)

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国与人身而鸟面,及焦侥。(贾谊《新书·修政语上》)

九州之外,乃有八殛,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大泽,曰无通;……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淮南子·墜形训》)

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异,习俗相反。(《淮南子·记论训》)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史记·秦始皇本纪》琅邪刻石)

二世曰:“吾闻之韩子曰:……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略同)^①

《吕氏春秋》《新书》《淮南子》《史记》诸书将大夏与三危、扶木、雕题、交趾、流沙、幽都、狗国、人身鸟面、焦侥等四裔地名相提并论,很容易被理解为异域荒远之地,其实,这些地名大都出自《大荒经》。古人不了解《大荒经》的地域范围,因见《大荒经》屡言海外大荒,博载殊方异类,误以《大荒经》为异域职方志,因此赋予其中地名以宇宙论意义,用以想象和标示非我族类的四方异域。实际上,《大荒经》世界观与山东地理相表里,大荒四方所及,不出今山东省周边。诸书将“大夏”与出自《大荒经》的四裔地名并列,意味着“大夏”当与《大荒经》属于一个共同的世界观和地理学传统,则大夏其地亦当由山东周边求之。诸书或以“大夏”为北裔之地(《吕氏春秋·为欲》、琅邪刻石),或以“大夏”为西裔之地(《新书·修政语》),而《淮南子·墜形训》则谓西北方曰“大夏”,则大夏当为绵延于山东西北方的一片广大地域。

《吕氏春秋·古乐》云:“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高诱注云:“阮隃,山名。”“阮隃”不见他书,《汉书·律历志》《说苑·修文》《风俗通·音声》均有类似记载,但“阮隃”均作“昆仑”,另外,《左传》成公九年正义、《世说新语·德行》引《吕氏春秋》,亦均作“昆仑”^②,可见今本《吕氏春秋》“阮隃”当为“昆仑”之讹。据此,则“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当作“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

昆仑之所在,是学术史上一个众说纷纭的悬案,或以为在新疆,或以为在青海,或以为在甘肃,皆以其为某座中国西部大山,实际上,昆仑最早出自《山海经》,由《山海经》不难定其所在。《西山经》云:“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所言为同一神山。如上所述,《大荒经》版图实与今山东版图相表里,《大荒西经》《海内西经》《西山经》所述即为鲁西大野泽周边山川与方国。这座被视为帝之下都、众神所在的鲁西神山,只能是泰山^③。《山海经》中,昆仑为“帝之下都”,实为古人祭祀上帝之所,后世帝王登封泰山以祭天,即源于此。

阮隃或昆仑既然就是泰山,则“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云云,表明大夏就在泰山附近。

① “大夏”的地名也见于《山海经》,《海内东经》云:“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此“大夏”显然是西域大夏,当为汉人注语窜入正文。另外,《逸周书·王会解》述四裔贡物,有“大夏兹白牛”,其下“伊尹四方令”云:“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犂犁、其龙、东胡。”“大夏”亦当指西域大夏,与古书“大夏”无关,故皆不录。

② 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二十二子》本,1986年,第643页。

③ 古人之所以纷纷将昆仑视为西方之山,原因仍在误读《山海经》。昆仑见于《西山经》《海内西经》《大荒西经》,可见其为中国西方之山,《山海经》称“河出昆仑”,可见昆仑必在黄河源头,又称昆仑在“流沙之滨”,可见其必在西部沙漠之外。殊不知《山海经》的地域原本不到中国西部,《山海经》屡言某水出自某山,也并非说某山为某水源头,而是说某山为某水所流经(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已指出这一点),《山海经》屡言流沙,并非指沙漠,而是指黄河泛滥所成沙洲。《禹贡》云:“黑水西河惟雍州,……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即据《山海经》而置昆仑于西部雍州。汉武帝据张骞的西域报告,将塔里木河所出的于阗南山定为昆仑,则是误将塔里木河认作黄河上游,故将其源出之山定为昆仑。关于《山海经》昆仑与泰山的关系,参见拙文《昆仑何在?〈山海经〉昆仑地理考》,《民俗研究》2019年第4期。

《史记》之《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载二世引韩非子说,称“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谓大禹开辟龙门,疏通大夏,将积水排泄至大海,大夏为龙门上游的积水之域。那么,龙门何在?“龙门”又见《禹贡》“导河章”,前人皆指为西河龙门,即今陕西省韩城市与山西省河津市之间的黄河禹门口。其实,黄河在西河龙门上下,行于两山夹峙之间,山高谷深,水流端急,周围地形沟壑纵横,既不可能有亭水(壅水)之虞,更不会有泛滥之患。明乎此,则知禹凿龙门的传说必不会发生于西河,最初的龙门必不在西河。

禹凿龙门以泄洪水之说,最早见于《墨子》,其《兼爱中》篇云:

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泝,注后之邸、呼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淦,以楫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①

墨子提到“西河”和“冀州”,学者均以为“西河”即晋陕之河,“冀州”即《禹贡》北方冀州,因此以为墨子所述禹治水的范围及于《禹贡》雍州、冀州之域。就地理形势而言,晋陕间的西河,山高谷深,实非洪水泛滥之地。墨子为宋人,其所谓东、西、南、北,当据宋国所在而言,其所谓“西河”,当仅指商丘以西之河,而非指山陕间黄河,其所谓“冀州”,亦不必是《禹贡》的北方冀州,而可能仅指宋的北方。此可由墨子所言四方之水知之。

“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渠水盖即《水经》渠水,又名鸿沟、蕢荡渠,《水经·渠沙水》云:“渠出荥阳北河,东南过中牟县之北,……南入于淮。”酈道元注云:“渠水自河与济乱流,东径荥泽北,东南分济。”^②渠水与济水一样,皆为因黄河决堤而形成的支流,渠水由荥阳东南流,沿途分出汴水、睢水、蔡水等支流,均东南流汇入淮水。皇水盖即黄水,《水经·济水注》云:“济水又东南径厘城东,……右合黄水,水发源京县黄堆山,东南流,……黄水又东北至荥泽南,分为二水:一水北入荥泽,……一水东北流,……北流注于济水。”^③可见黄水亦出自荥泽。荥泽为黄河决溢在河南形成的泽薮,渠、皇之水皆出自荥泽,实质上皆为黄河决口而成之泛流,墨子所谓“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其意盖谓渠、孙、皇三水同出自西河的渔窦,以泄洪水,“渔窦”当即荥泽与黄河相通的河口。然则,墨子所谓“西河”,实谓郑州、开封一带的河段,郑州、开封之河,相对于宋,固可称为西河,则墨子所言大禹治水的西境实在豫东一带。

“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淦,以楫东土之水”:孟诸为东方泽名,当即《禹贡》豫州的“孟猪”,《禹贡》云:“导菏泽,被孟猪。”据《禹贡》的记载,不难推见孟诸之所在,孟猪为菏泽所被,而菏泽为济水南支所经,则孟猪必在济水南支下游,故《淮南子·墜形训》云:“孟猪在沛。”汉代沛县正在济水入泗之处,孟猪当即济水与泗水交汇而成的薮泽,今其地则有微山湖,正位于宋都商丘的东方,则墨子所言大禹治水的东境实为鲁西一带。

由上所述,可知墨子言治水地理,实以宋地为中心,则其所言北方诸水和地名,亦当在宋境以北求之。

“北为防、原、泝,注后之邸,呼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防、原、泝三水不见载记,但春秋时,宋、鲁之间有防地,《春秋》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杜预注:“高平昌邑县西南有西防城。”汉昌邑县在今金乡县西北,《墨子》防水或即流经此防地之水。金乡县在宋都商丘东北,故墨子谓“北为防”;呼池当即滹沱,为河北平原之水,历史上曾为黄河下游支流之一;“底柱”在呼池之下,必非今三门峡的河中底柱,而当为黄河下游地名;燕、代、胡、貉皆为东北方之地,凿龙门以利燕、代、胡、貉,则龙门必在黄河下游北流河段,《墨

① 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四,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68—69页。

② 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25页。

③ 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七,第195页。

子》不归龙门于西方,而归之北方,可见其所谓“龙门”必不在晋陕之间的西河,其所谓“西河”亦必非晋陕之间的西河。

大禹凿以泄洪的龙门,在黄河下游,《淮南子》亦可为证,其《时则训》云:“龙门、河、济相贯,以息壤堙洪水之州,东至碣石。”河、济为水名,龙门为河水所经,所谓“龙门、河、济相贯”,其义谓河、济经龙门而贯通,则龙门不可能在与济水遥不相涉的黄河上、中游,而只能在与济水会通的黄河下游,据此实不难考见龙门之所在。

《水经·河水注》记载,河水在茌平县东经四渎津与济水相通:

河水又东北流,径四渎津,津西侧岸,临河有四渎祠,东对四渎口。河水东分济,亦曰济水受河也。……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也。^①

北魏时,黄河经茌平县(今茌平县东)东而北流,济水则在黄河以东不远北流,四渎津是一条在今茌平、长清之间沟通河、济的水道,经由这一水道,河通济,济通泗,泗通淮,淮通江,因此成为古代中原水路交通的枢纽,故谓之四渎津。

茌平黄河以东不远即为济水,其地古有石门。《水经·济水注》云:“水有石门,以石为之,故济水之门也。《春秋》隐公五年:‘齐、郑会于石门,郑车儋济。’即于此也。京相璠曰:‘石门,齐地。’今济北卢县故城(在今东阿县西北)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门,去水三百步,盖水渎流移,故侧岸也。”^②这座位于今济南长清区西南的石门,在春秋时就已存在,其始建则不知在何时。石门为济水上的水门,与位于茌平、长清之间的四渎口相去甚近,当即上古时期沟通黄河与济水的渎口所在,亦即四渎口的故址,由于黄河水道移徙,到北魏时,四渎口已北移,但石门故址犹存。

茌平、长清间这条沟通河、济的渠道除有运河功能外,应当还有分洪功能。河、济之间为兖州,兖州西为大河,东为泰山,黄河一旦决口,东为泰山所阻,排泄不畅,兖州之域即成泛滥之区,兖州自古多水患,正缘于此。长清石门作为沟通河、济的渠道,正可在黄河洪水时分流济水,借此减轻洪水对黄河的压力。明乎此,则知传说中“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的龙门非此石门莫属,而禹辟龙门以泄洪水的传说,也只能产生于这一地理背景,石门以上、河济之间、泰山以西的洪水壅积之区,即《禹贡》兖州之地,当即所谓“大夏”。

黄河由西而来,至东阿、茌平一带遇到泰山阻挡不得不折而北流,济水则沿泰山西麓而北流,故河、济二水在茌平、长清间相去最近,沟通最易。茌平、长清之间沟通河、济的水道,不管是洪水冲决,还是人工开凿,其为禹辟龙门传说的诞生地,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尸子》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于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山海经·北山经》郭璞注引)《吕氏春秋·爱类》亦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在上古洪水传说中,龙门之外,吕梁为另一个妨碍黄河洪水排泄的关口。

世人皆以吕梁为山西吕梁山,其与西河龙门同出于附会,不言自明。《庄子·达生》云:“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孔子一生足迹未曾及于西河,其所谓吕梁,必非山西河东之吕梁山。《水经·泗水注》谓彭城吕县“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吕梁也。……悬涛崩湍,实为泗险,孔子所谓鱼鳖不能游。又云:悬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今则不能也”^③。以为即孔子所谓吕梁,在今江苏铜山区东南五十里,今为徐州吕梁风景区,正为夺泗入淮的黄河古道所经过。酈道元既知泗水上有吕梁,即孔子所观的吕梁,却又于《河水注》以河东离石县吕梁山为大禹治水之吕梁^④,明显是为了迎合《禹贡》龙门而不得不首鼠两端。

了解了龙门、吕梁的真正所在,大禹治水传说的地理背景也就昭然若揭了。鲁西平原地处黄河

① 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五,第143页。

② 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八,第208页。

③ 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五,第602页。

④ 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第82页。

下游,其东则为泰山,豫东河道一旦决溢,鲁西平原即成一片汪洋,洪水东流无路,只能由鲁中南丘陵的南北两翼排泄,龙门与吕梁,一在泰山西麓的河、济之间,一在徐州东南泗水之上,正为鲁西洪水排泄所必经,故欲排泄洪水,必北导龙门、南辟吕梁,方能导水入海。《墨子》《尸子》《吕氏春秋》所述大禹凿龙门、辟吕梁之说,皆以龙门、吕梁为治水之要害,当即以此为地理背景,墨子、尸子当犹知此意。相传既久,后世之人则早已不知龙门、吕梁之真实所在,故《禹贡》置之于西河,而龙门、吕梁之所在以及大禹治水之真义遂不复可闻。

古史传说犹如现今的地方传说,都是在特定的地域内流传,以特定的地理环境为背景,因此,传说的人物和事迹尽管多出杜撰,其中的地名却往往有着真实的地理环境为依托。大禹治水传说只能流传于洪水泛滥之地,其中的地名也只能求诸洪水泛滥之地。夏墟所在的“大夏”之地,为洪水传说中位于龙门以上的黄河洪水淤积之区,只能是指鲁西北泰山西麓、河济之间及其周边易遭黄河洪水泛滥波及的古兖州之域。这一带相对于山东地区,在西北边缘,故在东方人的宇宙观中“大夏”被视之为西裔或北裔之地;其地洪水浩荡,大泽广布,有如汪洋大海,故《淮南子·墜形训》谓之西北方“大夏”曰“海泽”;其地为河、济水路交通枢纽,经济水入河可通中原,经泗水南下可入江、淮,来自齐地的海盐经此可以运往天下四方,故《吕氏春秋·本味》有“大夏之盐”^①。

最后再来看《管子·封禅》所说的“大夏”,《管子》书借齐桓公之口自言其征伐所至,西征大夏、流沙,《史记》之《齐太公世家》《封禅书》所说与《管子》同,《齐太公世家》《正义》云:“大夏,并州晋阳是也。”^②以晋阳为大夏所在,其说本自《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杜预注,无非都是因先有唐在河东的成见而臆断。实际上,《管子·封禅》云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将“大夏”与“流沙”并举,正足以证明大夏不在河东,而在鲁西。秦汉以后的学者,见古书所谓“流沙”,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西垂的流沙大漠,西垂大漠肯定非齐桓公车辙马迹所能及。“流沙”屡见于《山海经》,不仅见于西方,亦频见于北方、南方、东方,顾颉刚先生在《五藏山经案语》^③一文中指出,《山海经》之流沙不应视为西方沙漠,实为海畔河滨常见的沙洲。沙随水流,故谓之“流沙”。鲁西豫东平原,常为黄河泛滥所波及,其地自古多流沙,至今在鲁西北黄河故道还有流沙地貌遗迹,齐桓公西征所涉的“流沙”,当即指鲁西北平原因黄河泛滥而形成的沙河。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流沙既在鲁西,则大夏所在,从可知也。

由上所述,可知“大夏”之“夏”,本义当指藪泽沮洳之地,《禹贡》云:“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灏、沮会同。”“雷夏”又名雷泽,可见,“夏”有泽义,则“大夏”或即指大泽。所谓大夏,其本义或指鲁西豫东之间因常遭洪水泛滥而藪泽广布、原隰沮洳的古兖州地区。夏之名“夏”,盖因其地处大夏。

总之,泰山西麓、河济之间的古兖州,既是殷商早期之所都,亦是夏墟之所在,殷因于夏,殷早期之所都亦必为夏的故墟,诚如王国维所说,夏“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所以夏墟肯定不会在与殷墟遥不相及的河东,这本是很简单的道理。

子产不愧“博物君子”之称,所讲的参、商兄弟分家的故事一定非常古老。不过,他虽然讲述了一个蕴含着古老历史记忆的传说,却不知道故事中的大夏和唐并不在晋地,因此错误地把这个传说安插到了晋地,致使自古迄今的学者皆深信夏墟在河东,从而给后来的历史认知造成巨大的麻烦。其余波所及,尤其是经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放大,竟至于从根本上误导了现代的古史研究和考古发掘。

现既知古书中记载的夏墟不在河东,而在鲁西,则夏墟考古就应该将目光转向鲁西地区。传说

① 《山海经》的《大荒经》所述地域相当于今山东版图,《海内经》为《大荒经》一篇,所述为大荒版图西南方地理和方国,相当于鲁西南。《海内经》云:“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有盐长之国。”此位于鲁西南的盐长之国,当是一个控制济、泗水道上食盐贸易的方国。

② 《史记》卷三二,第1491页。

③ 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65—266页。

中的夏代,在年代学上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考古学者在鲁西的聊城、菏泽、济宁等地区发现了多处龙山时期的古城遗址^①和众多大汶口、龙山、岳石、殷商时期为避洪水而筑造的丘居遗址^②,考古学界念念不忘的夏墟,可能就在这些考古遗址中。《吕氏春秋·君守》云“夏鲧作城”,《世本·作篇》云鲧“作城郭。”(《礼记·祭法》正义引^③)《山海经·海内经》云:“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尚书·洪范》云:“鲧堙洪水。”鲧为夏祖,鲧筑城、堙洪水的传说,可能就是源于夏人居于鲁西河、济之间垒土筑城、避水而居的历史记忆。

五、怀姓九宗

《左传》定公四年,子鱼追述鲁、卫、唐之封,不仅说明了伯禽、康叔、唐叔所封之地,而且还说明了三人所镇抚的族群,伯禽为“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康叔为“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唐叔为“怀姓九宗”。伯禽所封为商奄故地,康叔所封为殷墟,故其地所居之族皆为“殷民”。“怀姓九宗”,“怀”“隗”音通,《国语·周语》云:“狄,隗姓也。”王国维认为隗姓即鬼方,鬼方即戎狄之族^④。《左传》昭公十五年,晋大夫籍谈对周王云:“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可见晋地确多戎狄之族。王国维认为唐叔所受“怀姓九宗”,即西周时居于晋西北的戎狄之族,若果如此,则唐叔所封自当在晋地。

鬼方为殷商时入侵中国的异族,《周易》《诗经》已见记载。《周易·既济》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云:“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诗经·大雅·荡》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内爨于中国,覃及鬼方。”殷墟卜辞、周代金文亦有征伐鬼方的记载^⑤,可见鬼方为殷、周时期一直与华夏为敌的异族。至鬼方之所在,则众说不一,王国维《鬼方、昆夷、獯鬻考》以音韵学证鬼方、昆夷、獯鬻为一族之异名,并认为鬼方分布于中国西北。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⑥据《礼记》等书纣脯鬼侯,《史记·殷本纪》等作“九侯”,“鬼”“九”通,认为鬼方即《左传》九州之戎,亦即居住于洛阳附近的陆浑戎,其势力范围则北至太行,南至三涂,东至阳城、太室,西至荆山、终南。王玉哲《鬼方考》^⑦则认为鬼方与獯鬻为二族,在岐周以西者为獯鬻,鬼方则指进据中国之戎狄,春秋时与晋国屡有交涉的隗姓之狄亦即隗国,即鬼方之后,其地在晋南。实际上,自商至西周以迄春秋,戎狄民族横行诸夏之间而不恒厥居,故鬼方之所在亦不必拘泥于一地,唯鬼方之为戎狄民族,则可断定。

其实,据《山海经》记载,上古时期鲁北地区就有鬼方或隗姓之族居住。《大荒北经》云:“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目,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⑧王国维认为,“威”“畏”“鬼”皆一字之变,金文“威”即“鬼”字,因鬼、女二字皆象人跪形,形极相似,故“威”字变而从“女”作“威”,虢叔钟“鬼”即作“威”^⑨。然则,《大荒北经》谓一目国威姓,即等于说一目国为鬼姓,亦即鬼方。《海内北经》云:“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而一目。”殷墟卜辞皆以“方”称国,“鬼国”就是鬼方,鬼国的形象“人面而一目”,其实就是一目国。古人将鬼方想象为“一目国”,大概正如古希腊人将野蛮人想象为独目巨人,旨在形容

① 张学海:《试论山东地区龙山文化城》,《文物》1996年第12期。

② 张启龙:《从鲁西南堽堆遗址看古荻泽地望》,谢治秀主编:《齐鲁文博:山东省首届文化科学报告月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385页。

③ 《礼记正义》卷四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451页。

④ 王国维:《鬼方、昆夷、獯鬻考》,《观堂集林》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90页。

⑤ 周金文《小孟鼎》记孟伐鬼方献俘受赐之事,《梁伯戈》记鬼方蚩,见王国维《鬼方、昆夷、獯鬻考》;王玉哲:《鬼方考补正》辑录数条涉及鬼方的甲骨卜辞,见《中华民族早期源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4—151页。

⑥ 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二重证据与文明探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85—125页。

⑦ 王玉哲:《鬼方考》,《中华民族早期源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8—151页。

⑧ “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目,是威姓”,今本作“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比较《海外北经》关于一目国的描述:“一目中其面而居”,可知“一曰”当为“一目”之讹。

⑨ 王国维:《鬼方、昆夷、獯鬻考》,《观堂集林》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89页。

野蛮民族的凶猛强悍,令人惊悚。

《大荒经》所记地域相当于今山东省版图,《大荒北经》《海内北经》所记方国和景观皆在鲁北,鬼国在《大荒北经》《海内北经》中均处于西北隅,表明鬼方实居于鲁西北。

前人不明《山海经》版图范围仅限于齐鲁之域,见《大荒北经》《海内北经》记载有鬼国、戎狄、犬戎,又因后世戎狄之患多见于西北秦、晋边陲,故认为《山海经》西北隅已远及于西北边陲。实则,据《春秋》《左传》记载,春秋时,戎、狄横行齐、鲁、宋、卫之间,邢、卫因为戎、狄入侵而不得不迁都,即使国力强盛如齐国,亦数度遭受戎、狄的侵犯。可见,直到春秋之世,鲁西北尚为戎狄所盘踞。《山海经》所记载的居于西北海外的鬼国和一目国,即鲁西北的戎狄之族,不必远求之于中国西北。

春秋早期,齐、鲁、宋、卫之间常有戎人出没,《春秋》隐公二年:“二年,春,公会戎于潜。……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隐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桓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庄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济西。”庄公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潜在今济宁市西南,唐即在今鱼台的棠邑,曹在今定陶,楚丘即在曹附近,这几个地方均在鲁西,其中,鲁公与戎人盟会的唐,当即唐叔所封之唐,可见,周初唐叔所封之地正属于戎狄出没之域,其所分之民“怀姓九宗”即居住于鲁西的戎族,怀姓亦即隗姓。

鲁西为隗姓所居,可由《大戴礼记·帝系》篇的记载得以佐证: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嫫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泚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颡顼。颡顼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鹄氏,产重黎及吴回。吴回氏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箴,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郯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半姓。……昆吾者,卫氏也;参胡者,韩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郯人者,郑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连者,楚氏也。

此文所述黄帝及其子孙所居之地,均在鲁、豫之域,且大都见于《大荒经》:

1. 黄帝居轩辕之丘:如上所述,轩辕之丘又见《大荒西经》,其地在鲁西大野泽畔。

2. 青阳居泚水:青阳即少皞,少皞之后郯国、莒国皆居于沂水流域。秦为嬴姓,亦为少皞之后,秦祖曰大费,当因居于费而得名,费即今费县,亦在沂水流域。泚水当即沂水^①。

3. 昌意居若水:《海内经》云:“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云:“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焱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鳞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颡顼。”盖即《帝系》所本。《海内经》为《大荒经》的一部分,其中场景多在“西南海”“南海”,所述为大荒世界西南隅景观,在地域上相当于鲁西南。

4. 昌意娶于蜀山氏女生颡顼:《海内经》谓颡顼之母为淖子,郭璞注引《世本》云:“颡顼母,蜀山氏之子。”郝懿行云:“蜀、蜀古字通,蜀又通淖,是淖子即蜀山子也。”^②蜀山氏盖以地为氏,其地曰蜀,亦作淖、淖。《大荒西经》云:“大荒之中,有三泽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也。”“三淖”为三个蝉联相通的沼泽。三淖载于《大荒西经》,其地当在鲁西。颡顼之母淖子,当即因居于三淖而得名。颡顼之母又名蜀山氏,《春秋》成公二年:“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蜀为鲁邑,《读史方輿纪要》卷三三济宁州汶上县西南四十里有蜀山,今其地为独山湖,与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三湖相通而统称为南四湖,颡顼的母亲族蜀山氏当即居于今微山湖一带,三淖当为今南四湖在上古时期的前身。

5. 颡顼娶于滕氏,滕氏当即春秋时滕国所封,在今南四湖东岸,今其地有滕县。

^① 青阳居泚水,《史记·五帝本纪》作“江水”,古之“江水”正指沂水,而非今之长江,说见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文史》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1—90页。

^②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79页。

总之,颛顼一支除青阳居于鲁东南外,其他均居于鲁西大野、泗水之滨。颛顼生老童,老童生吴回,吴回生陆终,陆终亦当居于鲁西。陆终氏娶鬼方氏生六子,即昆吾,卫氏所出;参胡,韩氏所出;彭祖,彭氏所出;云郃人,郑氏所出;曹姓,邾氏所出;季连,楚氏所出。这几个氏族,卫氏盖即后来卫国所封,其地在豫东河济之间;彭祖即彭国之祖,都彭城,即今徐州;邾氏盖即邾国,在今邹县,可见。颛顼一族发祥地,其地不出鲁西、豫东、苏北一带^①。

陆终娶于鬼方氏,鬼方与陆终为姻,其地当相邻,则鬼方氏居地必在鲁西及其周边。陆终所娶鬼方氏之妹名叫女隤氏,“隤”“隤”音近,女隤氏盖即隤姓,亦即威姓、怀姓。总之,《帝系》的记载表明,上古时期鲁西豫东一带确有隤姓的鬼方一族居住。

《春秋》《左传》的记载表明,直到春秋时期,鲁西豫东一带犹有隤姓的狄人。

晋国骊姬之乱,公子重耳(晋文公)出奔在狄,《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狄人伐廪咎如,获其二女,叔隤、季隤,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隤,生伯儵、叔刘。以叔隤妻赵衰,生盾。将适齐,谓季隤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过卫,卫文公不礼焉”。狄人伐廪咎如虏其二女叔隤、季隤,则廪咎如为隤姓之族。那么,廪咎如居地在何处呢?这可由重耳出奔路线推断。重耳由狄适卫,是在鲁僖公二十三年前后。据《春秋》《左传》记载,鲁闵公二年(前660)狄伐卫,卫迁于曹地楚丘,鲁僖公三十一年(前629),狄再侵卫,卫迁于濮阳帝丘,则鲁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卫当居于曹,即今山东定陶附近。公子重耳由狄过卫而赴齐,则其所居之狄当在定陶以西,即鲁西、豫东之间,这一带在春秋早期正为狄人横行之域,《左传》隐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楚丘在曹,可见春秋时今定陶一带确有戎狄出没,隤姓的廪咎如一族狄人所居当在附近,这说明,直到重耳奔齐的鲁僖公二十四年,鲁西豫东之间仍有隤姓狄族居住。

实际上,直到鲁宣、成公之际,隤姓的廪咎如一族还居于卫地。据《左传》记载,鲁宣公十五年(前594),“晋师灭赤狄潞氏”;十六年(前593),“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鲁成公三年(前588),“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廪咎如,讨赤狄之余焉,廪咎如溃”。至此,春秋以来肆虐中原齐、晋、宋、卫之间的赤狄一族终被肃清。清华简《系年》云:“周惠王立十又七年(鲁闵公二年,前660),赤翟王留吁起师伐卫,大败卫师于囿,幽侯灭焉,翟遂居卫。”可知鲁宣公十六年晋人所灭的赤狄留吁即鲁闵公二年入卫之狄。廪咎如为赤狄的残部,鲁成公三年被晋郤克、卫孙良夫联军所灭。此前的鲁成公二年六月,晋郤克、卫孙良夫刚帅晋、卫、鲁、曹诸国联军伐齐,战于鞌(在今济南),大败齐人。据此可以推断,成公三年晋郤克、卫孙良夫讨伐廪咎如之战,当在卫地附近,即在鲁西豫东一带。廪咎如所居,前人或以为在今山西太原市一带,或以为在今河南安阳市附近,都未免求之太北^②。晋、卫联军灭廪咎如之前,已于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和十六年(前593)先后灭掉赤狄潞氏、灭赤狄甲氏及留吁,廪咎如是赤狄一族最后的残余,其兵力当不至于太强大,若其地在晋国附近的太原或安阳,以当时晋国军队之所向披靡,欲剿灭之实无需假于外援(前此灭潞氏、甲氏和留吁之战,都是晋国军队独立作战),而此战之所以有卫国军队参加,正可见廪咎如去卫国不远,久为卫国之患,故晋、卫联军乘伐齐之战之余勇而一举肃清之。

综上所述,可见从商周之际直到春秋中期,鲁西豫东一带有隤姓的狄人居住,唐叔所分的“怀姓九宗”盖即其九个部落,故唐叔分有“怀姓九宗”,并不足以证明唐叔封于晋地,反倒可为唐叔封于鲁西之一证。

① 《国语·郑语》史伯为郑桓公言祝融八姓,“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鬻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郤、郃、路、偃阳,曹姓邾、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半姓乎?”祝融即陆终,比较《郑语》祝融八姓与《帝系》陆终六子,己姓昆吾,即《帝系》昆吾卫氏;彭姓彭祖,即《帝系》彭祖彭氏;妘姓有郃,即《帝系》云郃人郑氏;曹姓邾莒,即《帝系》曹姓邾氏;半姓楚国,即《帝系》季连楚氏,《帝系》六子之中,唯“参胡者,韩氏”在祝融八姓中无从着落。两说大同而小异,足见其渊源有自而传闻异辞。

② 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05页。

结 语

寻找夏墟,是古史重建的基本问题,也是考古学的热点问题。要寻找夏墟,必须以古书中关于夏墟的记载为依据。《左传》定公四年叔虞“封于夏虚”之说,是先秦文献中唯一一次关于夏墟的明确记载,这一记载又有同书关于叔虞封于唐国、居于大夏的记载相印证,故素为考古史者所重。叔虞为晋祖,而晋居河东,因叔虞封于夏墟而推定夏墟在河东,可谓顺理成章,故汉晋间学者即据此而断定尧、舜、禹之都皆在河东,河东夏墟之说因此著为定论,难以动摇。现代学者尽管不再像古人那样轻信古书,对古书中所载上古史迹不加辨析、照单全收,但对于河东夏墟之说却深信不疑,古史学者据其论夏王朝的地望,考古学者据其求夏都之遗址,李济在1920年代发起夏墟调查,即从晋南开始。

本文的研究表明,河东夏墟之说,尽管渊源有自、世所公认,久已被学界视为定论,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误解。《左传》成王灭唐而封叔虞于夏墟的记载,确实保存了周人关于夏墟、唐国和周初封国历史的真实记忆,子产所述商居商丘主辰星、唐居大夏主参星的传说,尤其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但是,前人疏于考证,不了解叔虞一族先封于鲁西(唐国)后迁往晋南的历史,想当然地认为叔虞所封之地就是晋国后来所居的河东,因此断定叔虞所封的唐国、夏墟即在河东。随着唐国、夏墟以及叔虞初封被从鲁西误置于河东,很多与之相关的古史人物、地理和事迹也被先后安插到了河东。于是,尧都在平阳,舜都在蒲坂,禹都在安邑,尧、舜、禹禅让的历史都是发生在山西,甚至连只能发生于黄河下游的洪水传说也被搬到了山西,禹为宣泄洪水而凿的龙门、辟的吕梁、通的大夏、疏的底柱,都一一被安置到了山西周边的黄河,而全不管山西黄河根本就没有发生洪水传说的地理条件,与此同时,这些历史掌故中所蕴含的古老而真实的历史记忆则遭到了埋没。

古史悠远,史事浩瀚,上古历史原本主要靠口耳流传,得以著于文字、载于简帛、传诸历史记忆的史迹仅是沧海一粟,这些古彩斑斓的古史碎片因为缺乏完整的历史编纂学作为依托,被裹挟于时间的洪流中随波逐浪,中间不知辗转经过多少人的口与手,叠经转述、阐释、剪裁甚至改窜,才流传至今。我们看到的古史传说和古书记载,已非其最初的模样。即使文字保持原样,后世之人也不可避免地带着历史造成的成见看待和理解这些文字,有意和无意的误解几乎是不可避免。一个地名的误解,可能导致对历史空间的全盘误置,从而使全部古史重建工作都误入歧途。正是有鉴于此,顾颉刚先生发起的古史辨运动,主张为了重建古史,首先需要辨析史料,只有将古往今来附加于古书史料上的误解谬说清洗干净,还古书史料以本来面目,才有可能在可靠的基础上重建古史,也才可能为科学考古学提供可靠的线索。

对于辨析古书、重建古史,顾颉刚先生提出了一系列极具理论性的思想原则。比如说,针对中国疆域叠经变迁,而古代学者因为缺乏历史地理学眼光,据后世大一统的中国地理想象上古方国地域,从而造成对古史地理和古书地名的误解,顾颉刚先生提出打破地理自古一统的观念,并主办《禹贡》杂志,亲自讲求古史地理学;针对古史传说原本多凭口耳相传,即使著于简帛以后仍不可避免地会因为因时因地而变改,顾颉刚先生提出用故事的眼光看待古史,并亲自搜集、研究孟姜女故事,试图通过这一研究,揭示传说故事发生、流传、播迁、演变的机制,作为辨析古书史料、清除层累造成的伪史说之镜鉴。本文对河东夏墟之说来龙去脉的考辨表明,河东夏墟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古史说,正是因为历代学者忽视古史地理的变迁和古史记载的传说特征而层累造成的古史说,最初仅仅是一个地名的误解而导致“夏墟”的误置,随后却像滚雪球一般,错误的古史认识越滚越大,直到现在,连考古学也被裹挟进去,古史层累造成的进程仍在继续。

只要人,包括历史学者,还置身于历史的洪流之中,他们就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历史被层累造成的进程就不会自动终止,历史学就不可能走出疑古时代。

[责任编辑 李 梅]

The Foundational Problem of Logic: An Answer from Jin Yuelin's Position

Liu Xinwen

Wang Hao present a project when he evaluated Jin Yuelin's academic career, but it was not implemented. We will take "the foundational problem of logic" as the main line to try to carry out this plan. In 1927, Jin Yuelin attributed the starting point of his all-encompassing neorealist system of philosophy to logic, but encountered the "logocentric predicament" when establishing the foundation for logic. In his philosophical work during his later years, he continued his early research on the foundation of logic, thinking that this problem was too big for the whole logic, thus focusing on the foundation of inference, and basing inference on "the possibility of thinking" and "historical facts". We think that Jin Yuelin's thesis can be regarded as an answer to the foundational problem of logic if inference is the core of logic. This answer goes out of the trap he encountered in his early work, which not only embodies the un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logic and history, but also embodies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taking philosophy as an ideological weapon to directly serve the needs of the current country" and "taking philosophy as a specialized study to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strive for a higher position for China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hilosophy".

Three Stars in the Sky: A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Geography and Legends of Xia Ruin

Liu Zongdi

Fu Sinian divided the Huaxia world in ancient times into two group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which the group of Xia is one in the west living mainly in the area of Henan, Shanxi, and Shaanxi. This theory has an obvious effect on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times as well as archaeology on Xia and Shang. And because of the discovery of large settlement sites belonged to Longshan Culture found in west of Henan, south of Shanxi, and north of Shaanxi, the opinion that Xia lived in the west almost becomes a consensus. One of the important evidences of the opinion is the record in the *Commentary of Zuo* that Shuyu, the earliest ancestor of the State of Jin, being enfeoffed the Xia ruin which is presumed as in Hedong, i.e. southwest Shanxi. However, by careful textual criticism of records in ancient books, it can be known that the State of Tang was actually in west of Shandong, and it was Xie, Shuyu's son, who began to move to Hedong. In that case,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Fu Sinian's theory as well as archaeology of Xia ruin and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history based on it.

The Possibility of Redescription of Medieval History (Conversations by Writing)

Editor's Note: The studies of medieval history ar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fields with the deepest accumulation, the most prominent achievements, and the most active young scholars. To what extent have the academic advancement in the last four decades especially in the last ten years changed our cognition of the basic prospect on medieval history? Do we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rearrange the basic clues of medieval history at present?...At the First Workshop for Young Scholars by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nd the 12th Young Scholar Association on Medieval Chinese History held in August 2019, the editorial office invited six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to discuss the theme of "possibility of redescription of medieval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ir own research or reflection. This group of articles are just part of achievements on the forum.

Various Activities of Local Literati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10th Century:**Focused on Liu Kai Family**

Yan Jianfei

Liu Kai family was a typical local literati family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10th Century. Family members were civilians, military officials, or military officials changed from civilians. They were appoint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or Military Commissioners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hold their officials in six prefectures of Weibo.